



中外文坛

中的城市想象

王德领
杨岸青 / 主编

ZHONGWAI WENXUE ZHONG DE CHENGSHI XIANGXIA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王慕飞

封面设计/郑珏



ISBN 978-7-5656-3666-0



9 787565 636660 >

定价: 59.00 元



中外文

中的城市想象

王德领 杨岸青 / 主编

ZHONGWAI WENXUE ZHONG DE CHENGSHI XIANGXIA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学中的城市想象 / 王德领, 杨岸青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656-3666-0

I. ①中… II. ①王… ②杨…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国外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092 号

ZHONGWAI WENXUE ZHONG DE CHENGSHI XIANGXIANG

中外文学中的城市想象

王德领 杨岸青 主编

责任编辑 王慕飞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70 千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1 辑一

- 1 张鸿声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 16 刘大先 北京的时空流转
——20世纪满族小说中的北京意象
- 48 杨庆祥 “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文学
- 51 王德领 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
- 63 张 莉 寻找结晶体，而非漂浮物
——关于城市文学创作的随想
- 71 徐 刚 “进城”的冲突与“改造”的焦虑
——《我们夫妇之间》及其批判的再阐释
- 83 冯 雷 北京现代文人故迹：城市文化地标与历史记忆锚点
- 96 廖四平 政治性与诗性的完美结合
——论袁可嘉的“都市”题材诗歌
- 111 季剑青 周作人笔下的北京风土
- 122 李建周 望远镜中的风景
——张楚小说论
- 135 艾 翔 占领城市：边缘青年现代意识的实践
——《红旗谱》再经典化的一种尝试
- 143 刘芳坤 “80后”的爱欲与文明
——“压抑性富裕期”的城市文学表达

- 156 薛红云 性别视角烛照下的北京城市书写
——以铁凝与冯唐为例
- 163 于涌 北魏孝文帝迁洛后洛阳文学的复兴与开拓
- 177 李艺 元朝大都的文学创作概说
- 186 李小贝 明清小说中的北京语言文化研究
——以《儿女英雄传》《小额》《春阿氏》为例
- 200 吴蔚 清代御制诗中的蓬瀛

207 辑二

- 207 孙秀昌 本雅明“巴黎幻境”解读
- 229 丁琪 摩天轮、空间生产与现代性
- 241 董琦琦 身体体验与城市空间关系研究
- 252 张勃 蜕变中的都市
——从《北京风俗问答》看 20 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的现代化
- 267 郑以然 北京大院的空间生产与文学再现
- 278 宋秋明 老北京/新北京：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
——以城墙城门、天安门为例
- 295 钱子丹 消费、环境、生存
——观念摄影再现城市的三个主题

301 辑三

- 301 韩加明 浅谈斯威夫特的名诗《城市阵雨》
- 311 杨岸青 伦敦意象的女性主义书写
——《伊芙琳娜》中的都市想象

- 320 夏晓敏 《汉弗莱·克林克》中的 18 世纪英国都市
- 331 张军丽 压抑与抗争
——布鲁姆视角下的都柏林及其想象
- 348 张国帅 在工业化浪潮中变异的小镇和挣扎的“畸人”
——论《小镇畸人》中的畸人现象
- 356 曾玲琴 无忧、无知、无爱的男性伴随者
——赛林格《九故事》里二战后的都市女性
- 365 田倩倩 20 世纪初消费文化在美国城市文学中的折射
——从《嘉丽妹妹》谈起
- 370 李娜 文学中的北京
——兼评老舍《骆驼祥子》伊万·金英译本
- 378 郑静 从市井琐碎到文化大观的通途
——试论林语堂《辉煌的北京》中的跨文化视角
- 386 陈卫红 “美国梦”的都市书写
- 390 齐海滢 喧嚣中的“宁静”
——《睡谷传说》的生态美学启示
- 396 王德领 编后记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张鸿声

无可置疑，上海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化城市。这不仅在于其政治、经济地位，更在于其精神意义。那么，上海城市的精神意义是如何确定的，在这中间，百多年来关于上海的文学又是如何参与其中，构筑了一个文学中的上海呢？而且，这文学中上海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的，还是被想象的？

一、现代性与上海想象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的情形相当特殊。上海建城虽有 700 年，但通常被看作鸦片战争后才开埠的城市，其功能以工商贸易为主，并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体系之中。由于其起源与功能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因而被称为“飞地”。应该说，这是中国极少数不太具有古城记忆与城市史逻辑的大都市之一，它的历史起点，通常是在与古代中国文化的断裂中被人们给予“历史终结”式的理解，即：上海史只是一部现代史，一部不断获得和已经获得现代性的历史。

对上海作为精神现象的理解，其基础是它的文化身份。但是，文化身份可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事实。按斯图亚特·霍尔的看法：“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又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

部构成的再现。”^①既然是“生产”出来的，也就不是完成状态的，其本身是不统一、有差异和变化的。对于上海来说，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性主导特征，并不能涵容其所有文化形态，而是在与非现代性的冲突、分裂、融合中形成不稳定、不成熟的状态。“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②

文化身份是需要叙述才能表达出来的，它来自一种话语实践，并深陷社会权力之中，“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③。上海是一个城市文本，既需要叙述也需要阅读。我们可能凭借了权力而对上海进行了叙述，而获得了对其文化身份单一性现代性的理解。在叙述中，其文化身份自身原有的不统一、差异与未完成状态，由于叙述者的需要依据整体化原则将其统一了起来。

那么，对上海城市的叙述究竟要服从于什么呢？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曾说：小说之类的叙事文体，“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④。这一看法或许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臆想的共同体”理论不谋而合。对于城市文本来说，对其叙述也往往掺杂着想象成分，因而受制于不同时期的中心意识形态。上海，由于其在20世纪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至尊地位，对其文化身份叙述中的最大权力因素就是现代性中有关世界主义的内涵，进而产生关于上海知识的两大谱系：一是从现代性有关民族国家意识出发，去认知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关于它的消费性、工业破败、堕落畸形等等

①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冈、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2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译，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③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冈、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2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④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派生特点以及它最终摆脱殖民体系、获得解放并成功摆脱资产阶级遗存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所包含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其与西方的同步，引领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为物质的扩张与物质乌托邦、大工业的、组织化的与摧毁传统力量的种种情形，使人们在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往往将上海视为现代中国的中心，将对上海城市形态与历史的理解上升为超越其自身的与超越其特定区域的（包括国家区域、地域区域与文化区域），具有了乌托邦的国家意义或世界性意义，城市逻辑也被等同于国家的逻辑与世界现代化史的逻辑了。

近代以来文学表现上海，应从晚清通俗小说开始，其对于上海的观察，在于“维新”与“腐败”两个方面，即写洋场与欢场，两者都存在想象成分。由“维新”所衍发的，是对于“进步”的上海融入世界的想象。由于“五四”进化主义学说的建立，“进步”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世界观，进而以工具论进入文学之中，开启了百多年来表现上海现代性的主导表意系统。“五四”以来，上海被作为新文化领地而被纳入城市现代性表现模式之中。至20世纪30年代与50年代，这一系统又添加进了关于世界主义背景下的国家表述和国家工业化的构想。到90年代，以消费主义为号召，又开始以对旧上海的想象为基础，规划关于上海过去的与未来的全球化图景。而晚清小说描写腐败的传统，也在后来渐渐地与现代图景相联系，如金钱万能、欲望主体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我们看到，百年来主流文学对上海的表现，大都是以世界主义的现代性逻辑为依照。由于受制于不同时期中心意识形态的要求，呈现出阶段性。每一时期对于上海的想象可能有所不同，但想象的逻辑没有变化。而每一次的想象，可能都是以淡化、甚至取消城市的现代性中心之外的多元特性为代价的。因而，在对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叙述中，现代性整体叙事往往代替了特定的上海叙事。

二、上海的国家想象：从殖民地到新中国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对1843—1949年的上海进行了研究，书中说：“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

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中的锁钥。”^①这一说法，几乎成为学术界公持的结论，在官修的上海史观念中也大量出现^②。事实上，上海比之任何其他城市都具有表达国家意义上的优势，其常常被当作现代中国历史元叙事的文本，因此，上海问题也就被赋予了民族国家意义，其自身的逻辑有时倒退居其次。

茅盾是将上海问题国家化的最典型代表。他将上海生活上升为国家意义，源于他的文艺观念，即唯物辩证法。他认为作家对“社会科学应有较为透彻的知识，并且能够懂得，并且运用那社会科学的生命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去从繁多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与动向”^③。在茅盾的理解中，文学表现生活应有两种要求，即社会性（本质）与时代性（动向），而能够恰当地承担起两者要求的便是城市题材。在这中间，上海自然成为最佳选择。也就是说，上海是现代中国最复杂、最集中、最能体现现代中国社会本质与动向的城市，这奠定了茅盾文学以上海转述国家问题的基础。《子夜》的创作动机，就在于解剖整个中国。茅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明确打算写出三个方面的国家问题^④，进而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所谓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本质”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茅盾世界主义的视野中，也即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他将上海纳入世界经济背景下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资本主

①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译，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上海研究中心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700年》，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作序，中云：“上海——近代和现代中国的钥匙，这是史学界的普遍认识。诚然，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上海700年》提供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填补一部分历史知识的明显的不足和缺乏，可以帮助他们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真谛。”

③ 茅盾：《〈地泉〉读后感》，见《茅盾选集》第5卷，15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④ 茅盾说：“我那时打算用小说形式写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以对工人阶级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义中心之下，上海更加边缘化。吴荪甫等上海民族资本家的破产，即是这种边缘化的具体表征。因此，相对于晚清民初小说中对于上海世界主义的表述，茅盾的小说存在的较多对世界主义本身殖民性的思考，即中国一方面进入世界，一方面又被世界中心所排斥。

同时，茅盾将这一结论导向有关国家“动向”的“革命”表述，而这一表述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有关国民性的阐释，而是转换为“阶级”的叙事立场。在更早的小说《虹》中，梅女士一方面愤然于革命者的腐烂，一方面又发现了上海作为真正革命主体的可能：“你没有看看真正的上海的血液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这种情形，在以后左翼的作品中有更多的表述，比如殷夫《上海礼赞》中，把上海说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从静安寺到黄浦江口这一段南京路，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道路，也是政治上以工人运动加入世界的象征。通过上海经济上的殖民性，茅盾企图以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国家使命。因为，吴荪甫等资本家既然不能成为国家力量，这一使命便被赋予在既能体现工业化现代性同时又体现阶级立场的新的国家力量——产业工人身上。

茅盾《子夜》对上海经济的认识明显带有国家意义的逻辑，即殖民地经济对于宗主国的依附。照这一逻辑，上海的工业破产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但是，上海的情形之特殊，恰恰是国家逻辑很难代替的。作为中国的一块“飞地”，上海城市历史的自身逻辑有时常常与国家逻辑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茅盾认定“中国更加殖民地化”时期，有研究界称为“上海效应”的奇特现象：“上海在近代经济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规律可循……即近代中国战乱频仍，而上海却往往由于其独特的政治条件维持着相对的安定……甚至出现内地战乱愈烈，上海经济的发展反而愈快的局面”^①，主要原因是内地资金流与人流大量进入上海。从现有资料看，每一次动荡时期，如太平天国、“孤岛”与解放战争，上海经济都会迅速上升。这便是上海城市逻辑不同于国家逻辑之处。对于另一种国家逻辑——产业工人经由斗争而成为城市主人，茅盾完全无法将其表

^① 上海研究中心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700年》，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现出来。这倒并不是说茅盾将罢工领袖都写成色情狂，而是说产业工人的斗争在全书中并未与其所描写的主体内容浑然一体，以致成为全书最差的一部分。茅盾一生都没有写出像样的工人运动题材的作品，这便是国家想象的局限。

茅盾为了以上海来表现国家意义，这使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只能表现在时代潮头上的上海，成为一部国家意义上的上海编年史。如《虹》之于五卅，《蚀》之于北伐，《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走上岗位》之于抗战初期的最大的国家政治——抗战等等。在“八一三”抗战与工厂内迁之后，茅盾已很少去写上海了。因为这之后的中国社会重心已由上海转至内地，这与茅盾的现代性想象完全不符。照茅盾的理论，他无法面对一个乡土中心的国家现状。因此，他即便有相当多的乡镇小说与散文，但大体都是表现其对上海经济政治的依附与联动。这使他的小说只能表现上海，或者还有少量受上海影响的江浙乡镇。他曾订立的《子夜》写作计划中“城市与乡村的交响曲”，事实上根本无法完成。

左翼的写作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种时尚，海派文学中也不乏对于上海的国家想象。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曾计划创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又名《中国行进》），该书并未面世，但从卷首引子《上海的狐步舞》中可以看出类似“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类的路子。《良友》杂志曾为此做广告说：“写一九三一年大火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其友人曾谈到他的创作计划：“他雄心勃勃地想描绘一幅 1931 年中国的横断面：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水灾、匪患；在都市里，经济萧条，灯红酒绿、失业、抢劫。”^①这几乎可以说是《子夜》的翻版。“大水灾”也好，“九一八”也好，都是国家问题的标志，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正恰恰是《子夜》的内容。当然，这倒不是说，海派作家有严重的国家想象表述，因为海派特别是后期海派多数作家恰恰是去寻找上海城市中与“国家”无关的经验，而是说，即使是海派这样的文学群体，也未能脱离以上

① 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

海来表述国家意义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表现上海的文学，其基础是新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这必然采取对城市的“断裂式”理解，即“新上海”与“旧上海”的区别：旧上海是半殖民地，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新上海则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象征，“它由国际花花公子变成了中国的工人老大哥”^①。这样一来，多元的上海城市的历史逻辑再一次被终止。很大程度上，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被当作了新旧国家的区别。与此相应的，是关于上海的“血统论”：上海是谁创造的。这引发大量的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压迫的国家叙事，并将无产阶级的财富创造与政治斗争作为连贯上海城市史唯一的逻辑线索。如电影剧本《黄浦江故事》（艾明之、陈西禾）、《我的一家》（夏衍、水华）、《七月流火》（于伶），话剧《上海战歌》（杜宣）、《地下少先队》（奚里德）、《无名英雄》（杜宣）以及小说《照片引起的记忆》（赵自）等等。在《战上海》一剧中，解放军曾因对苏州河北岸久攻不下导致战士牺牲太多而产生焦虑：“我们，是爱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是爱那些官僚资产阶级的大楼？”军长的回答既表明了新旧上海的断裂意义，同时也表述了在“革命”意义中上海的血统：“那些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工厂，是无产阶级弟兄们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以主人的身份来到了上海……那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工厂，再过几个小时，它就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财产。”其实，“血统论”并不强调旧上海作为新上海的母体意义，因为，旧上海的面貌恰恰是需要血统辨析才能够被颠覆的，因此“血统论”只是在“无产阶级”这个层面上寻找到一种逻辑，并把这个逻辑夸大为整个城市与整个国家的逻辑，或者说，城市的历史形态逻辑被国家政治替代了。

更有趣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又被作为了保守、停滞、僵化的国家计划体制代表。《寻找男子汉》《血，总是热的》等作品，都在改革这一层面将上海定格。城市自身逻辑中符合商品经济传统与潜质的一面，只是在后来的《大上海沉没》《蓝屋》等篇中才有所反映，国

^① 旷新年：《另一种摩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家意义上的上海想象才稍稍有所改变。但是，另一种基于全球化与消费性的国家想象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文学中开启。当然，这是另一种国家想象的意义了。

三、大工业与物质乌托邦：现代化意义的想象

在有关上海知识的另一谱系中，上海一直被看作是世界性的工业经济中心，并被置于一种现代化的逻辑之中。上海似乎被赋予了类似巴黎、伦敦、纽约等国际性都会的意义，而很少被当作纯然的中国城市去看待。这一对上海身份的认定，当然并不完全错误，但是，在文学层面的表述中，往往又是以取消上海作为一个东方都市的特性来获得的，从而以一种单一性、整体性的面目出现。

如前所述，茅盾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基于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的格局，这使茅盾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发生背离：一方面表现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边缘性，同时，由于过分强调世界主义原则，将上海工业经济以及相伴随的现代性对城市的主导夸大，其中包括乡村政治、经济对于城市的附属，人的各种伦理属性对于经济属性的附属，城市中心现代性对乡村文化的摧毁（以吴老太爷、蕙芳、阿萱为代表）。因此，在现代化这一层面，茅盾对上海进行了潜在结构中的想象，即上海非常资本主义化。这使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上海文化的乡土中国基础，并造成了浅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矛盾，产生出另一种上海想象。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一个难题。从茅盾的国家表述中看，上海是更加半殖民地化了，但在潜在的现代性逻辑中，又对上海怀有憧憬和激情成分。尤其是对吴荪甫的描写。朱自清在谈到对《子夜》的感受时曾说“可是，吴（荪甫）、屠（维岳）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了一部分读者对于他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不及的罢。”^①夏济安也谈到这一点，说作者“对自己笔下的男主角的赞赏几乎不加掩饰，这个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即使

^① 朱自清：《子夜》，《朱自清序跋书评集》，199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倒台崩溃，也落得像个巨人”^①。因为，吴荪甫的失败是一种“殖民地化”的国家逻辑表述，但他的野心、才干与胆略，与其说是现实的，毋宁说是一种对中国工业化的想象。因此，在想象的层面上，《子夜》有两个上海，一个是工业破败的、半殖民地的，一个则是理想中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对此，日本学者是永骏指出：“他心里本来带有这样的憧憬，所以才能写出来大都市工业化的宏伟情景。对于作家来说，不能吸引他的事物，他决不会把它屡次写在作品里。按简明的看法来说，我们应该指出茅盾是把自己的憧憬化为了作品。”^②茅盾一生偏嗜、坚执上海题材，即使是写乡村，也往往是率先承受上海城市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江浙沿海地区，其原因在于此。

再说海派中的新感觉派。新感觉派表现上海的全部基础，是力图表现上海在物质文化上趋近欧美的最新动态，所以，它采用的是一种巨大、全能的都市生活自身呈现的审美方式，寻找到的的是上海时尚生活中与欧美同步的国际风格。由于其叙事策略取决于对上海巨大的物质想象力，它必须将城市中的中国式成分，如乡土性、传统家庭生活、乡民式的不适感等特定的时间（历史感）与空间（东方性）内容统统取消。唯有“去”城市历史的做法才可能使巨大的现代性物质场得以呈现，以突出上海在消费性层面的世界性意义。所以，新感觉派似乎很少触及乡土中国中那种靠血缘、宗族、邻里所造成的稳定性的人群际合，而是在泯去了门第、阶级、血缘等传统关系之后，让人物以流动身份介入都市外在场景，人物与生活方式呈现出国际化的现代图景。

新感觉派赋予上海的意义是工业的、暴力的、男性的与征服的，它将对上海城市的体验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冒险性经历，如性、赛马、竞技、烈酒、恐怖与高大建筑物。有趣的是，城市自身物质、暴力性特质恰恰被赋予在女性人物身上，如“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穆时英《黑牡丹》）。女性人物符号化叙述所带来的是作者写作中对于物质征服感的获取，女性正像是巨大的都市本身，

①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见《茅盾研究在国外》，55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② [日]是永骏：《茅盾小说文体与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其身上神秘的物质性成为上海现代性的隐喻。这样一来，新感觉派将中国都市生活化为一种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拓殖的经验，一种“欧洲在场”，如同一些学者说的：“二毛子的双重‘东方主义’的陈述。”^①

由非历史时间状态出发，新感觉派完成了其空间的想象。新感觉派在体式形式上采用了一套被称之为“巡礼”式的表现方法。正如同穆时英惯常使用的用汽车飞驰浏览城市街景一样，它只浮于城市外在场景，而不企图进入马路背后有着历史沧桑的小巷，消除的是中西城市生活因时空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而在表现人物关系时，大量使用“聚散”式^②的模式，即在物质与时尚多变情况下丧失历史感，一切都在此时此地的实用感官中证明价值所在。对于这种城市的现时性的捕捉，电影镜头式的时空剪切、并置是最好的方法。取消城市深度，以避免造成对上海与欧美都市的差异性理解，这便是其创作的深意。

事实上，关于上海作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本表述，已经成为一个谱系，并不因其政治属性的改变而变更。表现上海的文学与电影素来都有以辉煌物质文明开头的写作模式，特别是电影中由低角度拍摄高大楼房已经成为一个传统^③，因为高大的洋房恰是跨越地域性的世界性符号。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表述由于获得了国家工业化蓝图的支持而得到强化。在 50 至 70 年代，关于上海作为工业、商业、金融中心的身份指认已经符号化，在消泯了外滩、百老汇大楼等外在场景原有的殖民与消费文化含义之后，成为纯然的有关工业化生产的符号式表述。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头部分大都也采用了“巡礼”式的表现方式，其目的一是突出上海城市的现代面貌，一是便于放弃对有关建筑场景所包含的殖民意义与市民消费意义的深究，而仅仅是以背景出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开场便是：“时隐时现的炮火染红了午夜的天空，火光中时而看到百老汇大楼的轮廓，时而看到江海关大楼的剪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365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② 在此，我使用“男女聚散”这一指称。见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114 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吴福辉则使用“邂逅”式，见《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174 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③ 比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马路天使》《万家灯火》。